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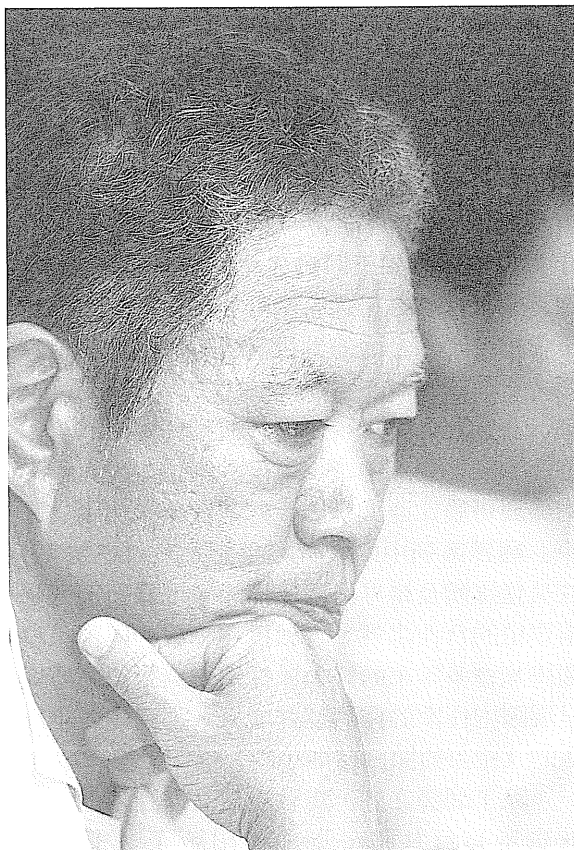
榮譽的文學獎頒予鄭炯明，表彰他對於文學界的貢獻，以及長期以人權、環保等主題創作現代詩的努力。

鄭炯明的詩擁有極特殊的風格，他身為笠詩社社員，十分能掌握笠詩社許多社員所採行的新即物主義創作風格，對客觀的物體給予精確、直接的立體敘述，在有限的題材下做精確的描寫。他也善於譬喻，尤其以物喻人，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以「蕃薯」這個物象表達台灣人十分不堪的命運，藉由蕃薯自生到死、春夏秋冬各異的姿態，來建構其與台灣人命運同質的關聯。

也由於鄭炯明具有醫生的身分，使他在作品中透露出醫者的仁心。將醫生關懷病人的天職與詩人對於土地及人民的關懷相互連結，運用醫生的冷靜及客觀，看出土地與人民的病徵和病根，再進以詩治療的階段，他同時運用兩種詩眼，來進行觀察及營構的工作，正如《混聲合唱——「笠」詩選》中評論的：「基本上是台灣知識分子內心的反省，蘊含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充分反映了台灣的現實，也包含了詩人對悲苦人世的關愛，對鄉土的擁抱，同時對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予以嚴厲的諷諫。」

鄭炯明先後出版過《歸途》、《悲劇的想像》、《蕃薯之歌》、《最後的戀歌》等四部詩集，詩作屢獲肯定，曾獲得青年詩人獎、笠詩獎、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他得到的諸多肯定正代表文學界對其文學的認同，他總希望用文學來治療台灣人民的創傷，安慰每個角落裡不為人知的悲歡，像古典音樂中不斷重複的賦格形式，創作出一首又一首的詩作，給予台灣人民重生及光明的契機。（陳國偉）

蔣勳： 看美的力量升起



聯合文學提供

一九九九年元月，蔣勳開始接任《聯合文學》雜誌社社長，離開了他在學院內的專業教學工作，重新出版了《歡喜讚歎》，並且續作了《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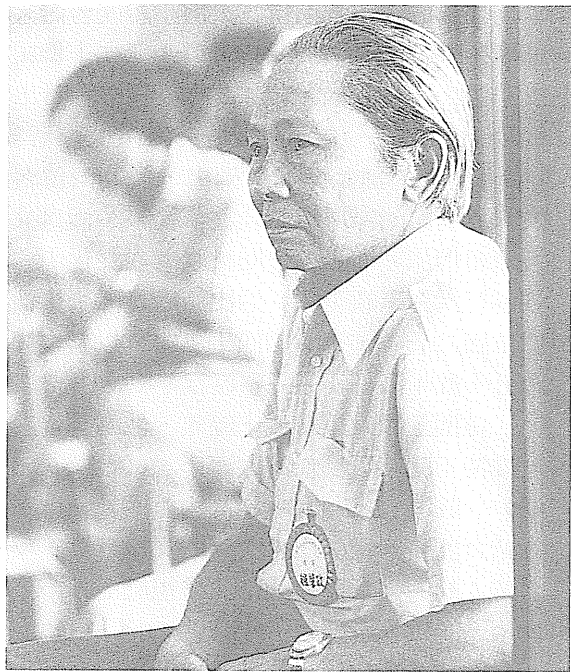
整整十年，蔣勳活躍於熱鬧沸揚的台北文化圈，因著對於文化活動的關愛與迫切的熱情，他不斷地發出改革與求新的呼聲。如今他逐漸沉澱思緒，並不是對美學的評介與報導不再關懷，而是冀望在冷靜地觀察與沉思之後，更深刻地透視這個時代，思索它將何去何從？

載浮載沉於其間的「人」，又該如何透過藝術的形象顯發真正令人感動的價值與意義。

於是蔣勳開始回過頭去熱愛具有原初生命力的「傳說」與「故事」，從「盤古」的故事中探索中國民族美學裡屬於「人」的主題。因為盤古的死亡，產生了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乃至於風雲，原來在民族的傳說裡，死亡的哀痛早已轉化為新生的喜悅，這天人合一的喜悅象徵面對死亡的成熟智慧。中國人因而甚愛山水，「那山水似乎是另一個形式的人。那山脈是人的骨骼，那田土是人的肌肉，那叢林是毛髮，而那脈脈無盡的大江長河，正是世代流不盡的生命的淚與汗吧。」蔣勳於是完成了他的新身體論，將希臘的人像素描與中國的山水畫比較，拿埃及伊西絲故事與盤古開天闢地相提，故事是簡單的，道理卻不言而喻，各民族有關人學與奧秘的秘密已在其中。

蔣勳出入於波特萊爾對美的沉溺以及托爾斯泰在美中的超拔，在文化圈中摯愛的朋友身上，他看到「美」的命定與符咒。當美的力量升起時，真可謂古今同一夢！「那阮籍的『窮途而哭』，徐文長的佯狂度日，那八大山人的憤世嫉俗，那攀爬在幾百公尺上一鑿一鑿雕刻佛像的無名的工匠，他們，每一個都可以在這小小的台北文化圈中找到再來人世的身影，叫著不同的名字，孤獨行走於街市之間啊！」人的悲傷、嫉妒、慾望等力量狂奔而出，與生命撞擊出藝術的火花，使得原本以為已獲得宗教救贖的寬容心靈，再度重重摔落。於是人們背著「美」的符咒，重新整頓人性。面對二十世紀末各學科所涵蓋的意志與物質不斷地互相濡染與膨脹，文學也在其間快速地被異化，甚至流於私利的牽引，蔣勳因而感悟「人」才是美術史中最值得探索的議題，儘管人的意義與價值被浮華、庸俗、混亂的表層所潛藏，但他卻不曾真正失去過作為一個「人」該有的尊嚴與光華。（朱嘉雯）

鍾肇政： 一九九九是「鍾肇政年」



鍾肇政提供

一九九九年，鍾肇政的名字似乎總是和桂冠聯繫在一起，這年可以說是「鍾肇政年」。

首先在夏天，文學台灣基金會與《民眾日報》合辦的台灣文學獎，特別頒發了「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成就獎」給他，以表彰他長時間致力於長篇小說創作對台灣文學的貢獻。在九月二十七日，鍾肇政又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所頒發的第三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獎。接著從十月二十日起，擔任元智大學駐校作家，每週三主持專題講座及座談，講述台灣文學發源、萌芽期、成熟期及戰後的台灣文學等主題。最後在十一月六日冬天時節，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舉辦了「福爾摩莎的文豪——鍾肇政文學會議」，會議中頒給鍾肇政台灣文學家牛津獎，並請台灣文學界宿耄葉石濤宣讀「獎